

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

艾慧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领域。

他们继承了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理论。陈启修把货币流通规律称为货币存在量的法则，他不仅分析了没有信用的情况，而且分析了存在信用交换的情况。对后者他以公式表示：

$$\text{货币必要存在量} = (\text{商品总价格} - \text{信用交换} + \text{旧债支付} - \text{债务清偿}) / \text{货币的平均流通回数}$$

陈启修只是指出了这一公式，没有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量变化三种情形，李达对此做了弥补，具体论述了这三种变化。对于公式 $QP/V = G$ ，字母由左到右分别表示：商品数量、单位商品的平均价值、确定期间的货币流通速度、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第一，在 P 定时， G 随 Q 的增加而增加，随 V 的减少而增加；反之，则反是。第二，在 P 上升时，如果 Q 以与它相同的比率减少，或者 V 不变而以同样比率增大，在这种场合， G 不变。如果比率不同，则 G 可能增加或减少。第三，在 P 低落之时，如果 Q 以与它相同的比率增大，或者 V 以同一比率减少，在这种场合， G 不变。如果比率不同，则 G 就会增加或减少。以后学者的介绍与陈启修、李达的差不多……对货币流通规律的普及起着重要作用。^① 李达认为货币充当流通手段时只是一种交换媒介，“人们只要能够用它买到与其名目价值相等的商品就够了”，因此，“纸币当然可以代替金币而流通”。而纸币“直接的是金（或银）的象征，间接的是商品价值的象征。纸币所以能发挥流通手段的机能，是在它代理金币（或银币）的限度以内”。“纸币只在代表价值量时，才是价值的符标。”^② 李达的论述准确、概括，尤其是他指出纸币间接的是商品价值的象征，更揭示了纸币的性质。李达还指出纸币若要完成流通手段机能，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即“纸币的数量，不能超过当时商品流通上所必要的货币量”^③。这其实揭示的是纸币流通规律。

他们继承了马克思对货币数量说的批判。他们将货币数量说的错误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对于货币价值的认识。货币数量说认为：

① 张家骥主编：《货币思想史》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05 页。

② 李达：《李达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80 页。

③ 李达：《李达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81 页。

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

艾慧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领域。

他们继承了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理论。陈启修把货币流通规律称为通货存在量的法则，他不仅分析了没有信用的情况，而且分析了存在信用交换的情况。对后者他以公式表示：

$\text{通货必要存在量} = \frac{\text{商品总价格} \times \text{信用期限}}{\text{平均流通回数}}$

陈启修只是指出了这一公式，没有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货币流通规律、确定期间的货币流通速度、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第一， $Q \cdot P / V = G \cdot C$ 字母由左到右分别表示：商品数量、单位商品的平均流

通速度、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第二，在 P 上升时，如果 Q 以与它相同的比率增加，或者 V 以同样比率减少。第三，在 P 低落之时，如果 Q 以与它相同的比率减少，或者 V 以同一比率增加。如果比率不同，则会增加或减少。以后学者的介绍与陈启修、李达的差不多少。

货币流通规律的普及起着重要作用。^⑤ 李达认为货币充只是一种交换媒介，“人们只要能够用它买到与其名品就够了”，因此，“纸币当然可以代替金币而流通”，是金（或银）的象征，间接的是商品价值的象征。

通手段的机能，是在它代理金币（或银币）的限度上，代表价值量时，才是价值的标志。^⑥ 李达的论述指出纸币间接的是商品价值的象征，更提示他指出纸币若要完成流通手段机能，必须有

的数量，不能超过当时商品流通上所必要的货币。这是纸币流通规律。

“继承了马克思对货币数量说的两点：一是对于货币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艾慧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6

ISBN 978-7-81098-891 9/F · 837

I. 中… II. 艾… III. 通货膨胀-理论研究-中国 IV. F8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7997 号

ZHONGGUO DANGDAI TONGHUO PENGZHANG LILUN YANJIU 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

艾慧著

责任编辑 张健 封面设计 周卫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 @ 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竟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7 印张(插页:2) 260 千字
印数: 0 001—1 800 定价: 35.00 元

序 言

随着中国转轨经济的不断深化,许多经济话题不仅为经济学家津津乐道,而且还成为平民百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趋势,而“通货膨胀”这种宏观经济现象就是其中之一。通货膨胀受到如此热切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它与个人、企业及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试想,当物价越来越高,而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物价增长速度时,你作何感想?当债权人以固定利率放贷,而不巧遇上通货膨胀,又将采取何种对策?

当然,宏观调控手段的逐渐成熟和有效,使我们远离了20世纪80年代末“谈通货膨胀色变”的时期,但通货膨胀至今仍旧阴霾不散,依旧是值得讨论的热点问题。本书提供的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以“通货膨胀”冠名的书籍近百部,1989~2004年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题目中含有“通货膨胀”词汇的文章大约有3 160篇之多,如此宏大的研究的确不可小视。而本书作者的努力好比于砾石中挑选金矿,按照时间和本土化进程的双条线索将现有研究成果的精华部分呈献给读者面前。漏选不可避免,但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读者多淘几遍,定会有所得。

通读艾慧博士的这本专著《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三个特色:一是学科交融、理论性强。著作以研究剖析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发展轨迹为主线,把经济思想史与金融学、财政学等理论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既发扬中国经济思想史剖析入微的优良传统,又体现当代中外经济理论在通货膨胀研究中的应用,从而进一步扩展通货膨胀理论的研究视野,增强了研究成果的思想深度。二是资料翔实,论证充分。著作以数百种相关资料为基础,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与外国巧妙结合,不仅对当代中国的通货膨胀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与论证,又经过独立思考,提出了

自己的思想观点,自成一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三是融会贯通,开拓创新。著作并没有停留在既定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上,还进一步探讨中国和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异同,存在异同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西方通货膨胀理论实现本土化的过程。这些都表明,作者具有良好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能够较为自如地驾驭纷繁的经济思想资料,从中理出头绪,才写出这样一部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当然,这本书也还有可以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的地方,例如,关于我国当前和今后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的因素、途径、形式以及作用等,还可以作一些分析。尽管如此,我觉得这本专著的出版,对认识今后如何避免通货膨胀有着积极的参考作用,同时也为系统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尹伯成

2006年4月

前　　言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组成部分,本书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通货膨胀(Inflation,以下简称通胀)理论的演变过程,这是第一要务。笔者将中国通胀理论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国学者对西方通胀理论的评价;二是受到西方通胀理论的启发或者是借鉴西方通胀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的通胀现象,使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更具有说服力,即西方通胀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三是基本属于独创的中国通胀理论。但笔者的思路并不局限于此,还要探讨西方通胀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换言之,西方通胀理论为何会经历本土化过程?中国通胀理论与西方通胀理论的异同点以及隐藏在差别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答案将决定我们对待西方通胀理论的态度和对中国通胀理论未来发展走势预察。

第一章“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的通胀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 20 世纪 30 年代是当代通胀理论之开端的结论,从而将写作范围划定为 20 世纪 30 年代到 1996 年这段历史时期。同时,对现有的中国通胀思想史著作给予评价并提出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从 1997 年起仍有关于通胀的零星思想,但通货紧缩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直到 2003 年,当出现局部过热、整个经济处于通胀的阴霾之中时,通胀又成为学术界争论的话题。1997 年之后的通胀思想将在“结束语”中加以介绍。第二章对四个方法论问题一一作出阐释,奠定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通过界定通胀的内涵,提出划分通胀理论的标准以及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确立本书主体部分的行文规范。

第三章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的争论作为纸币流通制度条件下的中国通胀理论之开端,当时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实施纸币流通

制度的最大障碍是通胀(狭义),因而他们对于纸币制度实施条件的探讨也多数是从防止通胀的角度出发的。当时通胀理论的异常活跃不仅是因为货币制度发生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入之初,学术界以评论为主,还不可能很快地应用于中国通胀现象的分析,因而传统的通胀思想仍占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开始于1978年的经济制度变迁对通胀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因而,第四章开门见山地为读者展开一幅1979~1983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画卷。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中国学者面临着传统和突破、守旧和创新之间进行选择。具体到通胀理论上表现于通胀存在性和衡量指标的争论、通胀概念的多样化、通胀成因研究思路的分歧以及对待西方通胀理论的态度等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通胀理论以介绍和引进为主,在评论时仍然习惯性地采用传统的批判式研究方式,倾向于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依据,而不是从理论的前提假定及所处的经济环境出发进行客观的理解和评论。尚未借鉴西方的通胀理论解释中国的问题,如果说借鉴,也仅限于某些名词。综上所述,这一时期通胀理论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性质。

第五章在本书中所占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1984~1992),单就通胀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中国转轨时期通胀理论的研究框架已初具雏形。这一时期的通胀理论具有两点突破:一是通胀成因复杂化。由财政赤字引发通胀的单一成因论转变为面向总量因素、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全方位多角度思考问题的研究模式,而且加入货币因素之后,通胀理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为了做到脉络清晰,笔者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为一整套通货膨胀传导机制,反过来说,几乎每位学者的思想都是传导机制上的某个片断。正是由于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只注重传导机制的某个片断,且不同的学者重视的片断会有所差别,争论就出现了。然而,笔者认为对传导机制的争论要比对成因的争论有意义得多。二是出现了西方通胀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中国学者借鉴西方理论创建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需求拉动理论以及结构性通胀理论,尽管在名称上与西方理论相同,而内容却大相径庭,笔者将其归因于相应的体制因素,只要体制因素不变,上述不同将持续存在下去。

第六章的通胀理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即在原有基础上的后续研究和对通胀周期性反复的解释。通胀指标已经不再局限于衡量指标,而是扩展为预警指标和发生指标两类,预警指标是一个具有预测功能、意义重大、尚待发掘的课题。总量分析中的“成本推进型”通胀理论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同西方的“成本推进型”通胀理论亦有差异,“低效率说”作为中国独特的通胀理论自成体系。有的学者致力于挖掘最根本的体制因素而成为通胀周期性反复较为权威和合理的解释。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通胀是综合性经济现象,因而倾向于将总量分析、结构分析、体制分析以及货币因素综合起来解释通胀,形成了三种归纳总结方式:成因列举法、归因法和机制分析法。

第七章分别针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与预期”两个专题展开评述。“促进论”和“促退论”是第一个专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通过分析,作者总结出中国利用通胀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相对于西方来说条件是非常苛刻的。粘性预期理论是中国学者的独创,它区别于西方的外推式预期理论和理性预期理论,相比之下预期理论发展时间短暂,理论本身也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

第八章作为本书的结束语,除了总结前七章的理论框架之外,笔者重新审视通胀的传导机制,认为中国和西方的通胀理论对于一次性物价上涨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对于持续上涨的过程缺乏充分的理由。笔者借鉴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力求描述更为精确的动态过程:一次物价上涨过程本身可以通过预期和货币供给的内生增长产生出新的冲击,致使物价再次上涨。使得本该达到均衡的过程,却产生出长期的非均衡力量。换言之,通胀是由一系列短期均衡的点所组成,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胀本身又存在着非均衡的力量,推动着物价不断地离开这些均衡点,持续抬升。基于以上理解,本书认为稳定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和采取需求性货币调控方式将是治理通胀的有效措施。

目 录

序言	1
前言	1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概述和文献回顾	1
第二节 国外通货膨胀理论概述	14
第三节 中国通货膨胀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及评价	18
第四节 研究范围的确定	23
第二章 基本事实和立论基础	27
第一节 对通货膨胀内涵的反思	27
第二节 通货膨胀理论的分类标准	32
第三节 研究途径与方法	34
第四节 选题意义和创新点	38
第三章 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与停滞	41
第一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对三大理论的评介	42
第二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通货膨胀理论	47
本章小结	53
第四章 承前启后的通货膨胀理论(1979~1983年)	57
第一节 计划体制下的经济状况概览	58
第二节 通货膨胀理论的经济背景和理论基础	62
第三节 通货膨胀理论的基本结构和主要观点	65

第四节 中国学者对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初步认识	82
本章小结	89
第五章 通货膨胀理论的争鸣时期(1984~1992年)	94
第一节 改革背景与理论基础	96
第二节 通货膨胀概念的演化	101
第三节 通货膨胀理论传统研究方法的发展	103
第四节 通货膨胀成因的总量研究	116
第五节 通货膨胀成因的结构研究	139
第六节 货币市场对商品市场的溢出效应	161
第七节 通货膨胀成因的体制研究	176
本章小结	178
第六章 通货膨胀的后续研究(1993~1996年)	184
第一节 改革背景	185
第二节 通货膨胀预警指标的设定	186
第三节 通货膨胀成因的后续研究成果	190
第四节 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研究	213
本章小结	214
第七章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预期的专题研究 ..	215
第一节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215
第二节 通货膨胀与预期	224
第八章 结束语	230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1

第一章 导论

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这一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话题，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就一直困扰着全球的经济学家。对通胀的评判经济学家们意见分歧，褒贬不一。普通民众持一致的反对态度，各国政府对此也没有多少好感，领导人总是声称自己的政府能保持通货稳定，并一直在采取各种抑制措施，但通胀并没有绝迹，在有些国家甚至愈演愈烈，并成为 20 世纪难以解决的课题之一。本书以通胀为中心，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为主要的理论视角，在系统考察和总结中国通胀思想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梳理通胀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维逻辑。笔者在书中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如果说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西货币理论的大碰撞成为中国现代通胀理论良好开端的话，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通胀理论的引入又为中国通胀理论的发展开启了视角，因而中国学者如何借鉴西方通胀理论解释中国特殊的通胀现象是以通胀理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绝对不可忽略的议题。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发端于 20 世纪 30 年代纸币流通制度下的中国通胀理论出现断档。如果我们大胆地仿效诸如货币思想史及财政思想史等专题性的提法，将本书及类似的以中国通胀理论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称作通胀思想史的话，那么作为思想史著作，这段历史也不可忽略。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现有的通胀思想史著作不仅忽略了以上两个方面，而且在方法论上存在诸多缺陷。因此，本书着重于以现有的通胀思想史著作为基础，重新建立研究框架。

第一节 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概述和文献回顾

在概述通胀理论之前，我们必须对中国的通货有个明确的了解，这就涉及到货币制度。笔者认为货币制度对通胀理论的发展影响很

大，尽管除此之外通胀理论还会受到政治和文化的影响。

货币制度是指一个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简称币制。对于中国的货币制度，叶世昌在《中国古近代金融史》^①一书的序言里作过如下判断：“货币本位制是西方传入的概念，中国对‘本位’一词曾经用得十分广泛，如称银钱并行为‘银钱本位’，钱币和布帛并行为‘钱帛本位’等，这是一种不严格的说法……中国在明中叶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解放前曾有学者提出明嘉靖八年（1529年）中国已实行了银本位制，实际上……这是财政措施，同货币制度无关……1933年废两改元前的民国时期的银两和银元流通称为‘银本位制’，这说法颇为流行，然而也不妥当。”他认为“中国的银本位制始于1933年的废两改元”。言外之意，在1933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货币本位制度。然而银本位制只实行两年多就被废除了，1935年的法币政策之后，中国一直实行不兑现纸币制度。总结起来，中国在1935年之前通货主要有贱金属货币、金银和纸币，只是不同时期通货组合有所差异。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金融理论界对通胀问题的研究一直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这与学术界和普通大众对通胀的基本认识有关系。新中国建立之初，“旧中国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仍为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痛苦的记忆”^②。新中国通过控制物价和大一统的金融制度不仅平息了12年（1937～1949年）严重的通胀局面，而且保证了物价的持续稳定。当时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平民百姓把纸币过量发行等同于通胀，从而认为只有剥削阶级的政府才会多发货币聚敛财富，通胀与政治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形成的共识是“通货膨胀是剥削阶级国家用来掠夺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手段”^③。通胀在中国消失的论断决定了中国学者对通胀的研究陷入停滞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的金融思想自始至终是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从事金融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苏联货币金融理论及其研究模式，对新中国金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① 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③ 徐禾等编：《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6页。

也产生了极为重要、极为深远、更为直接的影响”^①。除此之外的学说尤其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说都被排斥,对通胀理论的引进也基本上以“批判”和“驳斥”为惟一目的。与此同时,西方的通胀理论获得了长足发展,而事实上存在通胀的中国却回避了对通胀的研究。

一、1979~1983 年的通货膨胀学说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采取的是不同于计划经济的发展思路。从1979~1983年的改革措施来看,仍十分强调计划,但已存在市场经济的因素。物价改革走在改革前沿,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价小范围的放开,引起物价指数较大幅度的增长,与计划体制下政府定价相比,物价波动出现新的特征,与物价改革有关的通胀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争论焦点如下:社会主义是否存在通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生的通胀有什么不同,发生通胀的标志,财政赤字、信用膨胀与通胀的关系,货币层次的划分以及治理通胀的对策。这些争论不仅澄清了部分模糊认识,而且为进一步改革埋下伏笔。例如,通过对财政赤字、信用膨胀与通胀三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为以后银行独立于财政以及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职能的分离奠定了理论基础。笔者在总结和评价本时期的观点时主要参考《金融研究》和《经济研究》两类权威杂志,《黄达文集》、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人大出版社 1982 年版)、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刘絜敖的《国外货币金融学说》(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3 年版)、胡代光的《现代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批判》(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2 年版)等是引用率较高、能够代表当时学术水平的权威著作,也是本书的主要参考资料。

(一)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通胀,社会主义通胀与资本主义通胀的区别

部分学者囿于传统观点的束缚,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制定和执行通胀政策,中国不会有实质性通胀^②。

① 施兵超:《新中国金融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 页。

② 参见中国金融学会、广东金融学会编:《关于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的问题》,第 276 页。

有的采取中庸的说法,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通胀,但又试图说明其发生的偶然性,仍把通胀看作是仅与资本主义联系的现象。也有的提出了较明确的观点,认为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需要量就是通货膨胀,而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① 争论到 1981 年下半年,理论界一般倾向于承认中国存在通胀。

另外,还出现了主张用“缓缓的”通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苗头,但多数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主张要坚守财政上“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这表明在如何对待通胀问题上已产生分歧。

(二) 通胀的衡量标志

有人认为,由于物价调整,传统的 1 : 8 经验数据(市场货币流通量与社会零售价格总额比例)已不能准确衡量货币量与物价的关系,应该以物价持续上涨的程度作为衡量通胀的标志。有人认为,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通胀既表现为物价上涨又表现为隐蔽性的通胀即商品短缺,所以不能把物价持续上涨作为惟一标志,市场供求关系的松紧程度和票证多少也能反映通胀,主张两者配合使用。以上提到的三种通胀标志(经验数据、物价持续上涨幅度、市场供求关系的松紧程度和票证多少),两两组合构成了当时通胀标志的大部分观点。

(三) 通胀成因研究

自从“货币流通规律就是货币必要量规律”的观点获得学术界认同后,货币必要量的计算就没有停歇过。然而在具体探讨通胀原因的时候,一部分学者走的是另一条路,即探讨现实中的货币供给状况而不是货币量应该是多少的问题,并由此发展出总供求式的总量研究。

倾向于总量研究的学者认为:物价改革引起的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是正常现象,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非正常因素。政府盲目追求高产值、高速度,财政资金大量投向基建部门,在“基建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不合理体制下,流通中的货币增多了,这些增发的票子多数以工资、奖金的形式掌握在个人手里,压抑了多年的消费欲望即将爆发。同时基建战线长而非必要储备多,与人们有效需求相比,有效供给很少,助长了物价提高。在人们有钱买不到商品并且没有其他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只好把钱存入银行。因此,这一阶段的

^① 樊纪宪:《纸币流通必然产生通货膨胀》,《金融研究动态》,1980 年第 6 期。

通胀表现为政府投资单方面膨胀,多余的消费需求转化为储蓄而没有形成气候。学者们得出以下结论,没有物资保障的政府投资(政府赤字)是造成通胀的主要原因,银行再用这些资金进行放贷,产生信用膨胀,从而助长了通胀。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放弃对高速度、高产值的盲目追求,调整生产结构,使之与消费结构相适应。其次,银行从财政中独立出来,改革“基建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不合理体制。1984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确立中央银行体制,也没有明确的主导型货币政策。那时银行信贷计划只是国家物资调拨计划的一部分,货币政策只是财政政策的附属措施。

除了以上内容,学者们还对货币层次的划分和派生存款在通胀中的作用做了初步探讨,在货币流通包括现金和非现金(存款)方面达成共识,否定了以贷款指标控制货币量的做法,研究重点转向了非现金调控领域。

二、1984~1992年的通货膨胀学说

针对1984~1986年通胀研究的暂时失范,《经济研究》编辑部于1987年7月4日召集赵人伟、宋国青、张维迎、史正富、杨仲伟及贝多广等著名学者共同探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方向问题。经过讨论,学者倾向于把通胀理论的研究方法分为总量研究、结构研究和制度研究,有助于规范学术研究范式。1988年高通胀和1989年“抢购风潮”惊魂未定之时,经济学界已经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通胀了,这个时期通胀理论的发展得益于国外研究方法的引进。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理论、结构性通胀以及预期通胀等理论丰富了研究思路,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为学者提供了除逻辑推理之外的分析工具。但是,中国学者一开始就发现国外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通胀问题,于是他们创造出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即西方通胀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本阶段可供参考的高质量的杂志日渐增多,除了原有的两种之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动态》、《财经科学》、《经济学家》、《财贸经济》和《中青年经济论坛》等近百种经济类学术期刊脱颖而出,成为宣传通胀理论的阵地。除此之外又涌现出一大批权威性著作,如史晋川的《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樊纲等人的《公有制宏观经济

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钟朋荣的《中国通货膨胀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李拉亚的《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版), 蔡重直的《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以及邓乐平的《中国的货币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等等。

中国学者主要基于以下两个不同于西方的经济背景提出观点的: 第一,中国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混合型经济。第二,中国的财政、银行和企业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四大国有银行占绝对垄断地位,地方财政权力日益增大,有的文章称之为“地方财政有实际的货币发行权”^①。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保持一种“父爱主义”,三者的关系非常微妙。

(一) 通胀的形成原因(总量因素、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

中国学者借鉴西方理论创建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需求拉动理论以及结构性通胀理论,尽管在名称上与西方理论相同,但内容却大相径庭。这一时期的通胀理论体系庞大,因此在这里仅以中国通胀所特有的成因之一——体制因素稍作说明,笔者将在第五章作详细讨论。然而,从以下这些例子中我们也能看到与西方通胀理论的迥然差异。

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的研究报告认为,通胀的成因与机理可以从两方面看。首先,从承包体制上看,企业承包没有解决自我约束机制问题,原规定承包企业上缴利税与工资总额增长比 1 : 0.7,执行的结果却是,1985 年是 1 : 0.73,1986 年是 1 : 1.12,形成了消费基金膨胀。财政承包包括与产值密切相关的流转税,地方政府必然为增加财政收入追求产值高速增长,保护已亏损但尚能维持生产的企业,逼迫银行放贷支持地方高速增长,优先支持高利润率的加工业、消费品工业,忽视低利润率的基础工业。其次,从政策上看,政府对稳定与增长的宏观管理目标处理不当,使货币政策在无法同时满足高速增长与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情况下,事实上服从了高速增长。

有的学者从微观角度出发,认为企业产权模糊,没有把利润转化

^① 樊纲:《我国通货膨胀三种主要成因的理论分析》,《经济研究》,1990 年第 3 期。